

再论“夷夏东西”：二里头遗址及其周边岳石文化因素墓葬的辨识与研究*

张 飞¹ 贺 俊²

(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北京市 100101; 2. 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 河南 郑州市 450046)

关键词: 洛阳盆地; 二里头遗址; 墓葬; 岳石文化; 夷夏关系

摘 要: 岳石文化因素墓葬的时空分布特征表明, 岳石文化人群虽然存在一定聚居倾向, 但总体上与二里头文化人群杂居共处。两文化人群在漫长的时间内, 经历了从接触、融合、疏离到对抗的动态历程。二里头文化墓葬与岳石文化因素墓葬各项特征的比较研究显示, 在二里头遗址部分岳石文化人群在二里头王国可获得较高的政治经济地位, 对二里头文化的礼制观念有着强烈的认同感。这一认识为考古学探讨“夷夏东西”格局的形成过程与互动机制提供了新视角。

Keywords: the Luoyang Basin; the Erlitou site; burials; the Yueshi Culture; the Yi-Xia relation

Abstract: The spatio-temporal analysis of burials associated with the Yueshi Culture indicates that, although populations of the Yueshi Culture tended towards clustering at concentrated settlements, by and large, they intermingled with communities of the Erlitou Culture at the Erlitou site. Over an extended period, peoples of the two cultures contacted, integrated, estranged and confronted, undergoing a dynamic proces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burials of the Erlitou Culture and those associated with the Yueshi Culture reveals that certain individuals of the Yueshi populations might attain relatively high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tatus within the Erlitou polity and have strong acculturation to the ritual norms and ideological frameworks of the Erlitou Culture. This research offers a new perspective for the archaeological exploration into the formation and interactive mechanisms of “the East-West Dichotomy of the Yi and the Xia”.

岳石文化与二里头文化的关系是探讨“夷夏东西”这一经典问题的核心所在, 历来备受考古学界与历史学界的关注。自二里头文化确认以来, 二里头文化区内屡有岳石文化因素出现, 相关的梳理与分析亦不在少数。然而, 当前针对二里头文化区内岳石文化因素遗存的研究多集中于器物辨识、年代划分和传播路线等方面^[1], 对于器物背后的遗迹属性与特征关注较少, 这就导致对两文化所代表人群之间的互动历程和机制研究仍显不足。

近来, 我们在重新梳理中原地区岳石文化因素遗存的过程中, 于二里头遗址及其周边区域辨识出了一批随葬岳石文化因素器物的墓葬(以下简称“岳石文化因素墓葬”)。二里头文化时期, 岳石文化分布范围广泛, 最盛时期“包括了山东全省、苏北、皖北、豫东、冀东南以及辽东半岛南部”^[2], 仅核心区的海岱地区发现遗址数量就达300处^[3]。然而, 在如此广阔的分布区内, 性质明确且属于岳石文化人群的墓葬却屈指可数, 经初步统计仅有16座^[4]。相比之下, 我们在二里头遗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陶器生产与消费综合研究”(批准号: 25CKG010)、国家文物局全国考古人才振兴计划项目“三代都邑的墓地人群结构与血缘组织关系研究”(编号: 2024-263)、河南省文物局夏文化基础研究项目(项目编号: 豫文保〔2022〕172号)及山东省人文社会科学课题一般项目“岳石文化在夏商国家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的价值研究”阶段性研究成果。

址及其周边区域却发现了20座岳石文化因素墓葬,数量已然不少。鉴于墓葬在反映族群身份、社会组织和社会关系等方面的独特优势,这批材料无疑为深入探讨上述问题提供了新的契机。

一、岳石文化因素墓葬的发现与辨识

岳石文化陶器质地可分为夹砂和泥质两类,陶胎普遍较厚,但不同质地的陶器在制法、颜色和器类等方面存在差异。夹砂陶常用泥条盘筑而成,陶色以不纯正的褐色为主,颜色斑驳,灰陶较少,常见器形有大口罐、中口罐、深腹罐、甗和鼎等炊具及少数盛器。泥质陶以灰陶为主,黑皮陶亦较多,常见平底尊、子母口罐、盆、豆和盒等盛器及器盖。岳石文化陶器表面以素面为主,篦刮纹、附加堆纹、凸棱纹和绳纹较为常见,方格纹、卷云纹等出现频率较低,豆、尊形器和器盖等器物表面偶有彩绘。在器物造型上,岳石文化陶器盛行敛口、子母口、叠唇、假圈足及器底周缘外凸等特征^[5]。二里头遗址及其周边区域岳石文化因素墓葬的辨识,主要依靠的便是岳石文化陶器这些鲜明的特征。

(一) 二里头遗址的岳石文化因素墓葬

二里头遗址作为二里头王国的都邑所在,面积广大,不仅是中原地区发现岳石文化因素遗物最多的遗址^[6],也是目前发现岳石文化因素墓葬数量最多的遗址。既往的发掘工作将二里头遗址分为多个小区^[7],下面按照分区对墓葬中出土岳石文化因素器物进行介绍。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在撰写过程中对部分实物原件进行了核校,相关器物描述与原考古报告、简报及图录中的记载有差异者均在注释中标明。

1. IV区

1984YLV M72,出土陶爵、白陶鬻、

高领尊、三足皿、盆、平底盆、刻槽盆和中口罐各1件,以及2件陶豆和3件陶觚^[8]。其中,陶中口罐和爵具有岳石文化风格。陶中口罐(M72:13),夹砂红褐陶。侈口,束颈,弧腹,小平底,器表饰篦刮纹,口径10.5、高11.8厘米^[9]。(图一,1)陶爵(M72:2),夹砂灰褐陶^[10],侈口,管状流,扁圆腹微束,三角形尾,底微外凸,细长圆锥足外撇,宽带状鋈,尾部顶端附加小泥条装饰,鋈表面饰刻划纹,器表遍布篦刮纹,高20.5厘米^[11]。

1984YLV M93,详细信息未发表,目前仅知随葬品有陶子母口罐^[12]、深腹盆和爵各1件。其中,陶子母口罐和爵具有岳石文化风格。陶子母口罐(M93:1),泥质磨光灰褐陶,子母口,圆唇,束颈,鼓腹,平底,素面,口径11.5、高12.6厘米^[13]。(图一,2)至于陶爵,经笔者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核对原件,确认其为夹砂红褐陶,器表饰篦刮纹及不规整的横向刻划纹。

2. V区

II·VM54,随葬品有陶爵、圆腹罐、折沿盆、深盘豆、觚、平底盆、器盖、钵、小高领罐和残石器各1件。其中,陶爵具有岳石文化风格。陶爵(M54:7),泥质红褐陶。侈口,扁圆腹微束,三角形流尾,底微外凸,细长圆锥足外撇,宽带状鋈。腹上部附加泥条一周,近底处和器耳饰刻划纹,尾加梅花形泥饼,腹部有明显篦刮纹,口径10、高19.6厘米^[14]。(图二,1)

II·VM57,随葬品有陶三足皿、平底盆、圆腹罐、鬻、矮领尊、长颈壶各1件,以及陶豆、鼎各2件。其中,陶鬻具有岳石文化风格。陶鬻(M57:8),上部残,夹砂褐陶,薄胎,深裆,三袋足,圆锥形实足跟,足上装饰细线纹,足尖有明显篦刮痕迹,残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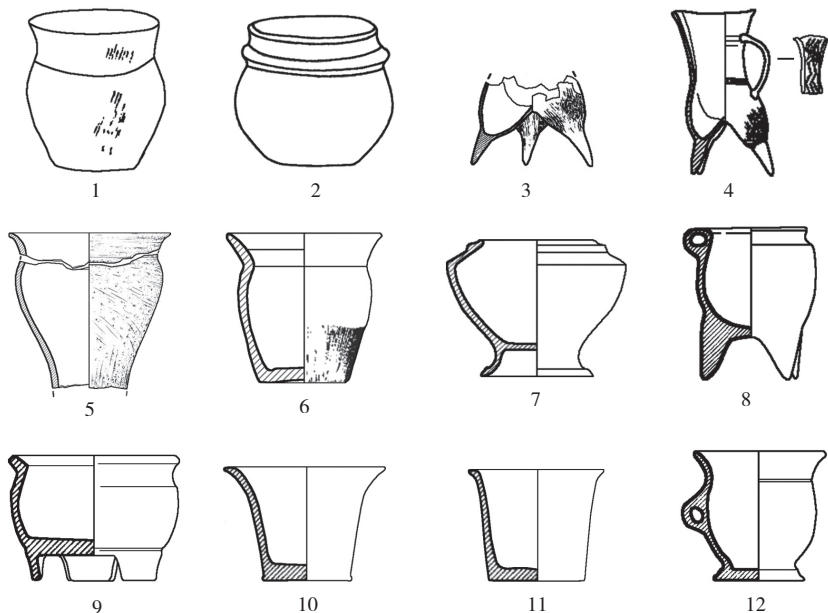
12.5厘米^[15]。(图一, 3) 该器与1982年Ⅸ区公布的1件完整的岳石文化风格陶鬻(H12:2)的下半部完全一样, 可资对比^[16]。(图一, 4)

2001 VM1, 墓中可能存在棺, 并铺撒朱砂。随葬品有陶平底盆、鼎各3件, 陶盃、爵和圆陶片(漆觚)各2件, 陶盆、豆、尊和壶各1件, 玉柄形器1件及漆器1件。其中, 陶爵具有岳石文化风格。陶爵

(M1:8), 夹细砂灰褐陶, 局部灰黑色, 侈口, 扁圆腹微束, 底微下鼓, 带状鋁, 三锥状足微外撇, 流两侧有对称小泥饼, 尾端有压印纹的泥条, 上腹部饰一周凸棱纹, 下腹部饰数周凹弦纹, 三足上有明显的篦刮痕, 流尾间距10.9、高16.9厘米^[17]。(图二, 2)

2010 VM9, 随葬品有陶甗、捏口罐、小口罐各1件。其中, 陶甗具有岳石文化风格。陶甗(M9:1), 底残, 夹砂红褐陶, 侈口, 圆唇, 束颈, 圆肩, 深腹斜收, 器表遍布篦刮纹, 复原口径23.4、残高22.6、厚0.4~1厘米^[18]。(图一, 5)

1963 VM202, 墓葬填土出土1件岳石文化因素陶大口罐, 保存完整, 推测可能是埋葬过程中有意放置的。陶大口罐(M202填土:01), 夹砂红褐陶, 侈口, 圆唇, 高领, 上腹微鼓, 下腹斜收, 平底微内凹, 下腹部遍布篦刮纹, 口径12.5、高12.4厘米^[19]。(图一, 6)



图一 二里头遗址墓葬及相关遗迹出土岳石文化因素陶器

1. 中口罐(1984YLI VM72:13) 2. 子母口罐(1984YLI VM93:1) 3、4. 鬻(Ⅱ·VM57:8、1982IXH12:2) 5. 甗(2010 VM9:1) 6. 大口罐(1963 VM202填土:01)
7. 簋(1987 VM20:2) 8. 罐形鼎(VM7:3) 9. 三足盘(1982IXM20:5)
10、11. 小杯(1982IXM8:2、3) 12. 单耳杯(1982IXM12:2)
(比例不一)

3. VI区

1987 VM43, 随葬品有陶圆腹罐、平底盆、爵、三足皿各1件及陶觚2件。其中, 陶爵具有岳石文化风格。陶爵(M43:3), 夹细砂棕褐陶, 流、尾较短, 腹部横切面为椭圆形, 平底, 圆锥状足, 扁带状鋁, 流部口沿处有锯齿状附加堆纹, 颈部及下腹部各饰一周凸棱纹, 鋁面饰刻划纹, 残高16.5厘米^[20]。(图二, 3)

1987 VM49, 随葬品有陶圆腹罐、折沿盆、三足皿、豆、鬻、爵、觚各1件, 以及漆器、骨针各1件。其中, 陶爵具有岳石文化因素。陶爵(M49:3), 夹细砂棕褐陶, 管状流, 马鞍状口, 细腰, 凸底, 扁带状鋁, 圆锥状足微外撇, 侧装宽扁带状鋁, 口沿的前后吻尖加厚, 左右各饰一枚小泥饼, 腹、鋁饰刻划纹, 通高18.8厘米^[21]。(图二, 4)

1987 VM20, 墓葬中铺撒朱砂。随葬品有陶圆腹罐、簋、卷沿盆、小口尊各1件, 陶

豆2件。其中，陶簋具有岳石文化风格。陶簋（M20：2），泥质磨光灰褐陶。敛口，子母口，广肩，平底，喇叭状圈足。口径13.7、高17.6厘米^[22]。（图一，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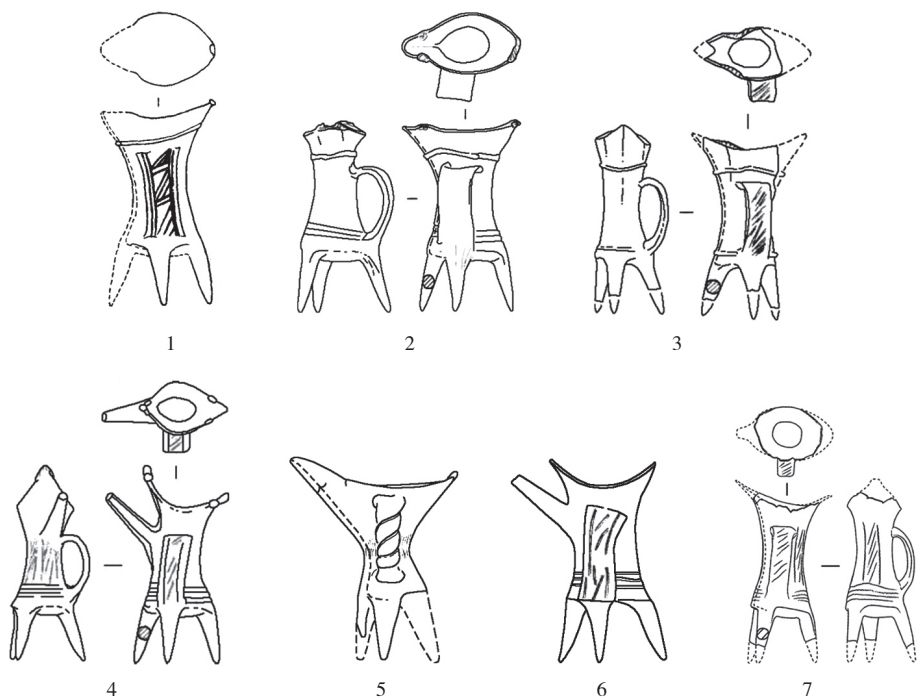
ⅥM7，基底铺有朱砂，且有木棺板灰痕迹。随葬品有陶盃、卷沿盆、罐形鼎、矮领瓮、爵各1件。其中，陶罐形鼎具有岳石文化风格。陶罐形鼎（M7：3），夹砂褐陶，器表呈黑褐色，口微侈，口沿一侧有环形单耳，束颈，小折肩，深圆腹，平底，锥形足，素面，口径9.6、高14.1厘米^[23]。（图一，8）

ⅥKM6，被破坏，详细信息不明，墓中仅残留一件完整的陶爵。陶爵（M6上：3），夹细砂红褐陶，侈口，短尾，尾部装饰两块小泥饼，束腰，圜底，麻花状罍，圆锥形足微外撇，器表饰模糊的篦刮纹，通高15.9厘米^[24]。（图二，5）

4. IX区

1982IXM20，随葬品有陶爵、鬻、尊、三足盘、圆陶片（漆觚）和绿松石饰各1件，陶圆腹罐、豆、盆各2件。其中，陶三足盘和爵具有岳石文化风格。陶三足盘（M20：5），泥质磨光黑陶，口沿上折，方唇，深腹微鼓，足较矮，器型较小，口径7.8、通高7.4厘米^[25]。（图一，9）陶爵（M20：10），夹细砂红褐陶，侈口，三角形尾较高，管状流，扁圆腹微束，平底，圆锥状足外撇，器身与釜面饰刻划纹，流尾间距8、通高16.2厘米。（图二，6）

1982IXM8，随葬品有陶爵、盃、三足皿、圆陶片（漆觚）和石柄形器各1件，陶豆、小杯2件。其中，陶小杯具有岳石文化风格。陶小杯（M8：2），夹细砂棕陶，敞口，尖圆唇，斜弧腹，平底，素面，口径10.9、高7.8厘米。（图一，10）陶小杯（M8：3），



图二 二里头遗址及其周边区域墓葬出土岳石文化因素陶爵

1. 二里头Ⅱ·VM54：7 2. 二里头2001VM1：8 3. 二里头1987ⅥM43：3 4. 二里头1987ⅥM49：3
 5. 二里头ⅥKM6上：3 6. 二里头1982IXM20：10 7. 偃师商城M26：5
- （比例不一）

夹细砂棕陶，敞口，略出小平沿，尖圆唇，斜腹，平底，素面，口径9.4、高8厘米^[26]。

（图一，11）

1982IX M12，墓中铺撒朱砂。随葬品有陶觚、单耳杯、圆腹罐、卷沿盆各1件。其中，陶单耳杯具有岳石文化风格。陶单耳杯（M12：2），泥质灰陶，侈口，尖圆唇，束颈，鼓腹，单桥形鬲，假圈足，略经磨光，口径11.9、通高11.6厘米^[27]。（图一，12）

（二）其他遗址的岳石文化因素墓葬

偃师商城遗址M26，随葬品有陶平底盆、三足皿、高领尊、鬲、爵、器盖各1件，以及陶圆腹罐、觚各2件，基底东北部还发现一具动物骨骼。其中，陶爵具有岳石文化风格。陶爵（M26：5），泥质红褐陶，侈口，扁圆腹微束，底微外鼓，圆锥状矮足微外撇，侧装宽扁带状鬲，腹外壁与鬲表面见刻划细线几何纹，下腹饰四周细线刻划纹，流尾间距12.1、残高20.2厘米^[28]。（图二，7）

伊川南寨遗址M32，随葬品有陶簋、爵、盂、圆腹罐、圆陶片（漆觚）各1件。其中，陶簋具有岳石文化风格。陶簋（M32：3），泥质磨光灰陶，敛口，圆唇，圆鼓腹，圜底，喇叭形圈足，口下饰两周深凹弦纹，圈足上饰4个对称的圆形镂孔。口径14、足径12.8、高16厘米^[29]。（图三，1）

伊川南寨遗址M25，随葬陶爵、簋、平底盆各1件。其中，陶簋具有岳石文化风格。陶簋（M25：2），泥质磨光黑陶，敛口，圆唇，溜肩，上腹近直，下腹斜收，平底，喇叭状圈足较矮，肩下部饰一周浅凹弦纹，下腹部及底部饰浅斜篮纹，口径16.8、底径17.4、高15.1厘米^[30]。（图三，2）

洛阳东马沟遗址M8，随葬品有陶盆、鬲各2件（包含1件白陶鬲），以及陶簋、罐各1件。其中，陶簋具有岳石文化风格。陶簋（M8：6），泥质灰陶，敛口，方唇，深腹微

鼓，平底，矮圈足，腹及圈足饰弦纹，圈足上饰4个对称的圆形镂孔，表面磨光呈黑色，口径19、高15厘米^[31]。（图三，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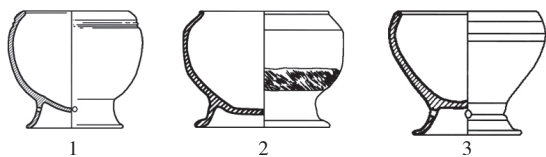
稍柴遗址M10，随葬品有陶三足器、豆各1件。其中，陶三足器具有岳石文化因素。陶三足器（M10：1），泥质磨光黑陶，敛口，圆唇，平底，鼓腹，下附瓦状足，器表上饰一周按压纹，口径17、残高11厘米^[32]。

二、岳石文化因素器物及墓葬的特征

二里头遗址及周边墓葬中出土的岳石文化因素陶器虽总体数量不多，但仍可大体划分为三类。

第一类器物为典型的岳石文化陶器，这类器物可在豫东及海岱地区的岳石文化中找到原型，包括甗^[33]、中口罐^[34]、大口罐^[35]、子母口罐^[36]和小杯^[37]。（图四，1~4、12）

第二类器物在典型岳石文化器物形制特征的基础上改造而成，但在岳石文化分布区内不见对应器物，包括簋、单把杯、三足盘和罐形鼎。簋上半部的形制特征与岳石文化中的平底钵^[38]较为相似，（图四，5、6）只是在其基础上添加了岳石文化圈足尊^[39]的圈足。（图四，8、9）单把杯除附加单鬲外，整体形制与岳石文化中最为常见的平底尊^[40]较为接近，（图四，10）尤其器底的假圈足更是与平底尊如出一辙。三足盘的原型应是岳石文化中的三足罐^[41]，（图四，7）只是口部进行较大的改变。罐形鼎与二里头文化中单耳罐形鼎有相似之处，（图五，1）但锥形



图三 二里头遗址周边区域出土岳石文化因素陶簋
1. 南寨M32：3 2. 南寨M25：2 3. 东马沟M8：6
（比例不一）

足、子母口、素面的特征却源自典型的岳石文化的鼎^[42]，（图四，11）为两种文化融合的产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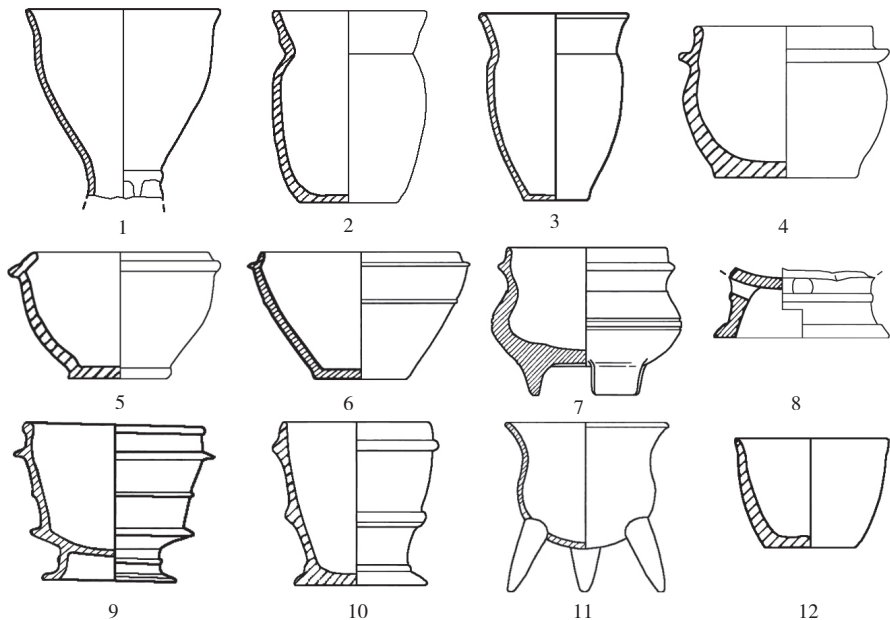
最后还有与二里头文化中常见器形形制上十分接近，但在陶质、陶色及装饰风格上与岳石文化器物有着密切联系的器物，其中爵占比最高，也包括少量鬻。以爵为例，具有岳石文化特征的爵器壁较厚，陶色则是以氧化气氛下形成的红褐色、黄褐色和棕褐色为主，器壁内外大多保留岳石文化器物中常见的篦刮纹或凸棱纹。（图六，1、2、4）此外，二里头文化中的爵、盃、鬻等陶礼器的器表多饰由刻划细线组成的几何纹^[43]，（图五，2、3）岳石文化因素的陶爵中也可见到类似装饰。然而，前者刻划的线条细密、锐利、规整，而后者的线条通常较粗，间距较大，且弯曲不直，显得很熟练或较为随意，存在明显的模仿痕迹。（图六，3、4）

综上所述，墓葬所见岳石文化因素器物

的构成较为复杂，应是基于特定目的或不同社会情境下的产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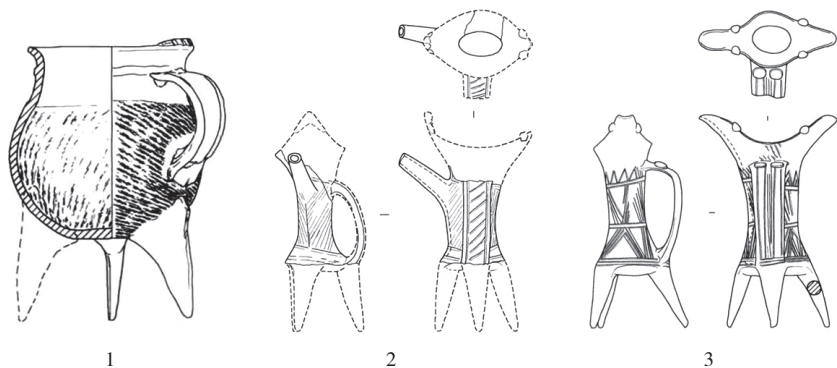
二里头遗址及其周边发现岳石文化因素墓葬20座。（表一）另外，二里头遗址尚有多座出土有岳石文化因素器物的墓葬尚未公布。因此，岳石文化因素墓葬总数应在20座以上。二里头遗址的岳石文化因素墓葬分布较广，遗址的Ⅳ区、Ⅴ区、Ⅵ区和Ⅸ区皆有分布。二里头遗址之外发现的岳石文化因素墓葬仅有5座，都位于洛阳盆地，在空间上当属于二里头王国可直接控制的王畿地区。

岳石文化因素墓葬年代从二里头文化一期延续至四期。二里头文化一期墓葬2座，均位于二里头遗址宫殿区所在的Ⅴ区。二里头文化二期墓葬数量最多，共计12座，其中二里头遗址Ⅳ区、Ⅴ区、Ⅵ区及Ⅸ区各2座，偃师商城、南寨、东马沟、稍柴遗址各发现1座。二里头文化三期墓葬3座，均位于二里头遗址，2座位于Ⅵ区，1座位于Ⅸ区。



图四 岳石文化典型陶器示例

1. 甗（清凉山H43：21） 2. 中口罐（尹家城T257⑦：12） 3. 大口罐（尹家城H604：5） 4. 子母口罐（尹家城T215⑦：18）
5、6. 平底钵（尹家城H15：3、尹家城H8：23） 7. 三足罐（东岳石T116⑤：58） 8、9. 圈足尊（东岳石G1①：39、尹家城H743：1） 10. 平底尊（尹家城H437：3） 11. 鼎（尹家城H750：1） 12. 小杯（尹家H8：16）
（比例不一）



图五 二里头文化陶器举例
1. 罐形鼎 (二里头2001 VM1 : 14)
2、3. 爵 (二里头2001 VM1 : 10、二里头2002 VM3 : 24)
(比例不一)

二里头文化四期墓葬3座，二里头遗址的V区与VI区各1座，南寨遗址1座。需要说明的是，VIKM6是目前唯一一座出土岳石文化因素陶爵的二里头文化四期墓葬，但由于该墓曾被破坏，未见其他随葬品，其年代仍存在疑问。如果考虑目前发现的其他岳石文化因素陶爵年代均为二里头文化二期，也不排除VIKM6年代为二里头文化二期的可能性。

当前所见二里头遗址及周边的岳石文



图六 岳石文化因素陶器装饰风格与制作技术示意图
1. 二里头1983YLIV/T25M33 : 6 2. 二里头VIKM6上 : 3
3. 二里头1982IXM20 : 10 4. 二里头II·VM54 : 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供图)

化因素墓葬均为土坑竖穴墓，墓葬方向则全部为南、北向。可辨头向的墓葬中，墓主人头向北者共8座，向南者共6座，两者数量差距不大。由于人骨保存不佳，不少墓主人的葬式不可辨，但可辨识者均

为仰身直肢葬。随葬品差异较大，较高等级的墓葬随葬有陶器、漆器、玉器等多种材质的器物，而等级较低者仅随葬一两件陶器。少数墓葬可见到铺撒朱砂的现象及棺具痕迹。李志鹏曾根据墓葬形制与规模，随葬品的数量、种类和精美程度，以及有无设置葬具等因素将二里头文化的墓葬分为五个等级^[44]。参考李氏的分级标准，二里头遗址及周边的岳石文化因素墓葬可分为三个等级，其中处于中上阶层的Ⅱ级墓（包括ⅡA和ⅡB级）共15座，占绝对优势。最高等级的Ⅰ级墓仅1座，属于平民阶层Ⅲ级墓2座，均占比较低。（见表一）

三、岳石文化因素器物中的技术传统与文化认同

二里头遗址及其周边区域墓葬出土的岳石文化因素器物中，除一部分器物单纯在形制上借鉴典型岳石文化器物外，更多的则是利用岳石文化的制陶技术创造新的器形。技术作为构建物质文化面貌最直接的因素，是人群基于自身的社会文化与自然生态背景主动做出选择的结果。技术于社会传统中获得，具有继承性，一旦形成便很容易固化^[45]。在此基础上，技术选择理论认为除了器物群的风格，技术也可以作为一种识别人群的文化符

表一 二里头文化时期二里头遗址及周边岳石文化因素墓葬信息统计表 单位: 米

序号	遗址名称	墓葬编号	时代	头向	规模(长、宽)	葬式	等级	其他
1	二里头	1984YLⅣM72	二期				ⅡB	
2		1984YLⅣM93	二期				ⅡB	
3		Ⅱ·VM54	一期	北	1.50、0.60	仰身直肢	ⅡB	
4		Ⅱ·VM57	一期	北	1.20、0.50	仰身直肢	ⅡB	
5		2001VM1	二期		2.60、1		I	墓中可能存在棺,并铺撒朱砂
6		2010VM9	四期		1.50、0.47~0.58		Ⅲ	
7		1987ⅥM43	二期	北		仰身直肢	ⅡB	
8		1987ⅥM49	二期	北	2.20、0.55	仰身直肢	ⅡB	
9		1987ⅥM20	三期	北	1.85、0.30	仰身直肢	Ⅲ	墓中铺撒朱砂
10		ⅥM7	三期	北	2.16、0.75		ⅡB	墓底铺有朱砂,且有木棺板灰痕迹
11		ⅥKM6	四期				不明	
12		1982ⅨM20	二期	南		仰身直肢	ⅡB	
13		1982ⅨM8	三期	北	1.98~2.02、1.14~0.85		ⅡB	
14		1963VM202	二期				不明	
15		1982ⅨM12	二期	南	1.80、0.50	仰身直肢	ⅡB	
16	偃师商城	M26	二期	北	1.86、0.82~0.94	仰身直肢	ⅡB	
17	南寨	M32	二期	南	1.70、0.65	仰身直肢	ⅡB	
18		M25	四期	南		仰身直肢	ⅡB	
19	东马沟	M8	二期	南	2.10、0.77	仰身直肢	ⅡB	
20	稍柴	M10	二期	南	1.58、0.55	仰身直肢	ⅡA	

注: 1.表中的空白表示墓葬的相关信息不详; 2.墓葬随葬品情况已在前文详述,表中不再重复。

号,帮助研究者解释文化交流、人群迁徙及社会身份认同等一系列问题^[46]。因此,从形制与技术的双重视角来看,墓葬中这批岳石文化因素器物应当是岳石文化工匠制作的,而非二里头文化工匠的仿制。

二里头文化墓葬目前已发现500余座,墓葬结构、墓向、葬式及随葬品等各方面特征均较为鲜明。具体来说,二里头文化墓葬均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墓,墓向以南、北向占绝大多数,东、西向墓葬极为少见。墓主人仰身直肢葬占绝大多数,头向以北向为主,南向次之。各等级墓葬在随葬品的丰富程度上差异较大,等级较高的墓葬多铺撒朱砂并配置棺具^[47]。墓葬中陶质酒礼器的类别较为固定,二里头文化一期的墓葬中觚、爵、盃和鬯4种陶质酒礼器已经出现,二期在一期基础上仅增加了角。角与爵形制接近,属于爵的

变体,两者之间具有可替代性。三期时,仅鬯退出历史舞台,觚、爵、盃的组合拥有绝对优势。四期的墓葬基本延续了三期时形成的酒礼器制度,未见明显变化^[48]。将前文岳石文化因素墓葬的特征与之对比可知,其几乎完全复制了二里头文化墓葬的规范。唯一区别在于,这批岳石文化因素墓葬在普遍随葬典型二里头文化器物的同时,极其一致地坚持随葬一至两件由岳石文化工匠制作、风格迥异且较为粗糙的岳石文化因素陶器。此种器物组合上的选择性并非偶然,而是墓主人对于岳石文化潜在认同的刻意表达。结合出土背景与器物属性,墓主身份极有可能为与二里头文化人群有着密切互动的岳石文化人群。当然,我们并不排除二里头文化人群基于某种动机获取他者器物并随葬的可能,只是强调在当前的材料语境中,前一种解释

的可能性更大。

人类学的研究已表明，当不同文化传统的人群在同一时间产生交集后，就会不由自主地产生“我者”与“他者”的文化比较，为了融入“他者”或强化“我者”，不同的人群则会有意识地选择弱化或突显自身的文化标识^[49]。从上述论证来看，当这些岳石文化人群来到二里头王国的核心地区，面对文明高度发达的二里头文化，他们选择了融入其中，这在墓葬特征中表现得极为显著。不过，在融入二里头文化的过程中，他们并没有完全抛弃“我者”的文化标识，而是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能够映射其文化传统与身份认同的器物。

四、岳石文化因素墓葬所见夷夏关系

尽管利用考古学文化辨识古代族群的研究范式颇具风险，但这一做法在世界各地依然盛行，尤其在那些历史悠久、族群名称有案可稽的地方^[50]。二里头文化与岳石文化所代表的人群主体分别是传说时代的夏族群与东夷族群，已成为考古学界的基本共识^[51]。故而，下面对于二里头遗址及周边发现的岳石文化因素墓葬的讨论，在一定程度上也可看作是对于夷夏族群互动模式的追溯。

在二里头遗址中，岳石文化因素在宫殿区及周边区域皆可见到。除此之外，二里头遗址常见的岳石文化因素墓葬常与二里头文化墓葬共处于同一区域，呈现一种逝后杂居的形态。考虑到二里头遗址“居葬合一”的特殊聚落布局已得到学术界的广泛认同^[52]，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些岳石文化因素墓葬背后所代表的东夷族群，在生前同样与本地的夏族群杂居共处。不过，虽然存在杂居现象，但就当前二里头遗址的发现来看，岳石文化因素墓葬所代表的人群在遗址特定区域也存在聚居性。如1987年二里头遗址Ⅵ区的第三

次发掘共发现58座墓葬，其中辨识出了至少3座岳石文化因素墓葬^[53]，再加上1959~1978年发现的2座，则Ⅵ区岳石文化因素墓葬共计5座。1982年二里头遗址Ⅸ区仅发掘210平方米，发现了19座墓葬，其中可辨识的岳石文化墓葬就有3座^[54]。由于相关简报仅公布了少数几座墓葬信息，两区域拥有的岳石文化因素墓葬实际可能更多。

从历时性的视角来看，二里头文化一期，宫殿区就已发现了2座岳石文化因素墓葬，表明岳石文化人群与二里头文化人群的接触在二里头都邑营建之初就开始了，前者极有可能参与了都邑的建设。二里头文化二期，岳石文化因素墓葬不仅在二里头遗址内分布最广、数量最多，而且开始出现在二里头遗址之外。岳石文化因素墓葬2001ⅤM1属于最高级别的Ⅰ级墓，它甚至与多座二里头文化高等级墓葬共同埋葬于宫殿区3号基址庭院使用时期的路土中^[55]。显然，这一时期应是夏族群与东夷族群交往最密切的时期，可称之为两族群的“蜜月期”。二里头文化三期，岳石文化因素墓葬的数量陡然减少，这与同一时期整个二里头文化区内岳石文化遗存的衰落趋势呈现出一致性^[56]，应是夏族群与东夷族群的疏离期。到二里头文化四期时，二里头文化分布区内岳石文化因素遗存成倍增加，分布范围也达到了最盛，但岳石文化因素墓葬仍然较少。这一时期岳石文化因素器物与下七垣文化因素器物共出频率与融合现象增加，且包含两者的遗迹均开始破坏二里头遗址宫城内的大型宫殿建筑^[57]。因此，可以肯定二里头文化四期时王国内发生了剧烈的社会变革，东夷族群和夏族群开始走向对抗的态势，而这极有可能关联到文献中的夷商联盟灭夏事件。

从墓葬的总体等级来看，岳石文化因素墓葬中处于中上阶层的Ⅱ级墓占绝对优势，

最高等级的Ⅰ级墓与等级较低的Ⅲ级墓均较少见。可见,以这批墓葬为代表的东夷族群实际生活在一种纺锤形的社会结构中,高等级与低等级的人群均占少数。这与二里头文化社会高等级贵族稀缺,越往下层人数越多的金字塔形社会结构有着明显区别。由此,可以认为二里头遗址及其周边的岳石文化人群是能够获得较高财富与政治地位的,他们在二里头王国的政治与经济生活中应当发挥着重要作用。《左传》《墨子》《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等传世文献中都曾记载,以奚仲、蜚廉、皋陶为代表的东夷族群,在夏王朝的手工业生产、资源获取与国家治理等重大事宜中做出了重要贡献,并获得了较高的社会地位^[58]。二里头遗址及其周边岳石文化因素墓葬在等级上的优位,以及其能够埋葬于宫殿区内的事实,正是这一历史记忆在考古遗存上的表现。

二里头遗址及周边岳石文化因素墓葬与二里头文化墓葬在墓葬结构、墓向、葬式和随葬品等特征上保持一致性,不见岳石文化墓葬中的合葬、石块葬、随葬品极简和墓葬不可分级等典型特征^[59],表明迁徙至此的岳石文化人群已然接受了二里头文化的丧葬制度。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岳石文化因素墓葬出土的器物里,由岳石文化人群利用自身制陶技术所仿制的二里头文化陶爵、鬯等陶礼器占比最高,这与二里头遗址中各类陶炊器占绝对优势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60]。这在很大程度说明,生活于中原腹地的东夷族群虽然坚持着自身的饮食习惯,但在礼器选择上表现出对夏礼的认同与钦慕。最近,方辉和赵永生两位学者综合古文字、人骨病理考古、古DNA等多种方法,论证了夷、夏族群虽在坐姿行为所反映的礼制方面截然不同,但却呈现出“用夏变夷”的整体趋向^[61],这

与本文的观察不谋而合。要之,从“夷夏东西”到“夷夏融合”的历史转变,其背后隐含了深刻的文化与礼制认同。

五、结 语

从二里头遗址及其周边区域辨识出的岳石文化因素墓葬,弥补了半个多世纪以来岳石文化墓葬发现的不足,更为从墓葬出发探讨夷夏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墓葬随葬品中刻意放置的岳石文化标志性器物表明墓主人应是以岳石文化为代表的东夷族群。在这一认识基础上,针对墓葬各方面特征的系统分析,至少表明以下几点:第一,墓葬在二里头遗址内的广泛分布及其与二里头文化墓葬的杂处,揭示两大族群之间的深度融合;第二,墓葬数量与等级的历时性变化显示,二里头文化一、二期应是两大族群的和平共处阶段,三期以后开始走向疏离,至四期时已发展为对抗态势;第三,中高等级墓葬占比较高的特点,说明东夷族群曾在夏王朝获得过较高的政治与经济地位;第四,对二里头文化墓葬制度的全面接受,以及对二里头文化陶礼器爵、鬯的仿制,体现了东夷族群对于夏礼的高度认同。这一系列认识不仅印证或更新了文献中关于夷夏关系的记载,更为探索中国早期国家“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路径提供了新的参考。

此外,二里头遗址及周边岳石文化因素墓葬的发现,也带来了一些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首先,二里头文化时期,中原地区作为二里头文化的主要分布区,发现了较丰富的岳石文化遗存,相关遗址已达30余处^[62]。然而,在这一广阔区域内,岳石文化因素墓葬仅发现于二里头遗址及其周边地区,在文化传播上呈现出极强的目的性,背后的动因仍有待继续探索。其次,二里头文化与二里头文化均同岳石文化有着极为密切的互动,

但整个中原地区发现的绝大部分岳石文化墓葬均属于二里头文化时期。目前仅在新郑望京楼遗址发现一座二里岗文化时期随葬锥足陶鼎的墓葬,应属于岳石文化因素^[63]。这一情况表明,从二里头文化到二里岗文化时期,岳石文化代表的东夷族群与中原族群之间的互动模式可能发生了重大转变。至于转变的具体动因与表现形式,尚有很大的讨论空间。

致谢:本文写作过程中得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赵海涛老师、许宏老师及山东大学考古学院方辉老师的指导,郑州大学考古与文化遗产学院王钧湛、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鲁紫璇、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丁煜晖等学友亦曾惠赐许多宝贵意见,在此一并致谢。

- [1] a. 方辉. 二里头文化与岳石文化[J]. 中原文物, 1987(1): 58-66.
b. 栾丰实. 二里头遗址中的东方文化因素[J]. 华夏考古, 2006(3): 46-53.
c. 靳松安. 河洛与海岱地区考古学文化的交流与融合[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6.
d. 朱君孝, 李清临. 二里头晚期外来陶器因素试析[J]. 考古学报, 2007(3): 295-312.
e. 徐昭峰. 夏夷商三种文化关系研究[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3.
f. 赵海涛. 二里头遗址二里头文化四期晚段遗存探析[J]. 南方文物, 2016(4): 115-123.
- [2] 同[1]c: 123.
- [3]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山东20世纪的考古发现和研究[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5: 284.
- [4] a. 方辉. 墓葬所见岳石文化与下七垣文化关系举例[J]. 中国历史文物, 2010(4): 11-13+28.
b. 郭荣臻, 曹凌子. 岳石文化墓葬简论[M]// 东方考古: 第23集.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24: 7-19.
c. 张溯, 王晓君. 城子崖遗址岳石文化墓葬NM5及相关问题[J]. 南方文物, 2024(3): 137-144.
- [5] a. 赵朝洪. 有关岳石文化的几个问题[J]. 考古与文物, 1984(1): 92-99.
b. 方辉. 岳石文化区域类型新论[C]// 刘敦愿先生纪念文集. 济南: 山东大学出版社, 1998: 225-243.
- [6] 贺俊, 张飞. 论豫西晋西南等区域的岳石文化因素[J]. 考古, 2025(5): 79-91+2.
- [7] 许宏, 陈国梁, 赵海涛. 二里头遗址聚落形态的初步考察[J]. 考古, 2004(11): 23-31.
- [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二里头陶器集粹[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 71-73.
- [9] 同[8]: 71+353.
- [10] 经笔者在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核对原件, 可确认此爵为夹细砂灰褐陶, 与发掘报告所认定的“泥质灰褐陶”在质地描述上略有差异.
- [11] 同[8]: 71+353.
- [12] 原图录将此器物命名为“直领小罐”, 本文采用“子母口罐”之称以符合典型岳石文化区的命名惯例。下文中的器物名称凡与原考古报告、简报或图录名称不符之处, 皆基于上述定名原则。
- [13] 同[8]: 84+354.
- [1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偃师二里头[M].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9: 72+74+397.
- [15] 同[14]: 71-72+397.
- [16]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 1982年秋偃师二里头遗址九区发掘简报[J]. 考古, 1985(12): 1085-1093+1108+1094+1155.
- [1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二里头: 1999~2006[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14: 991-997.
- [1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河南洛阳偃师二里头遗址宫殿区2010~2018年墓葬发掘简报[J]. 考古与文物, 2025(11): 16-32+2.
- [19] 同[14]: 94.
- [20]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 1987年偃师二里头遗址墓葬发掘简报[J]. 考古, 1992(4): 294-303+385-386.
- [21] 同[20].
- [22] 同[20].
- [23] 同[14]: 253+398. 该墓编号使用报告墓葬登记表中编号。
- [24] 同[14]: 325.
- [25] 同[16].
- [26] 同[16].
- [27] 同[16].
- [2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河南洛阳偃师商城遗址2024年二里头文化墓葬发掘简报[J]. 考古与文物, 2025(11): 33-40.
- [29]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伊川考古报告[M]. 郑州: 大象出版社, 2012: 41+88-89.
- [30] 同[29]: 39+88-89.
- [31] 洛阳博物馆. 洛阳东马沟二里头类型墓葬[J]. 考

- 古, 1987(1): 18-22+76-77.
- [32]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 河南巩县稍柴遗址发掘报告[J]. 华夏考古, 1993(2): 1-45.
- [33] 北京大学考古学系, 商丘地区文管会. 河南夏邑县清凉山遗址1988年发掘简报[J]. 考古, 1997(11): 24-35.
- [34] 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教研室. 泗水尹家城[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90: 215.
- [35] 同[34]: 213.
- [36] 同[34]: 217.
- [37]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乐陵尹家遗址发掘报告[M]// 海岱考古: 第十辑.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7: 200.
- [38] 同[34]: 224.
- [39] a.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队, 青岛市文物局, 平度市博物馆. 山东平度东岳石遗址发掘报告[M]// 考古学集刊: 第17集.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0: 11.
b. 同[34]: 223.
- [40] 同[34]: 223.
- [41] 同[39] a: 27.
- [42] 同[34]: 208.
- [43] a. 同[17]: 1492-1493.
b. 彭小军. 陶爵的制作与生产: 以二里头遗址出土资料为例[M]// 三代考古: 五.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3: 73-84.
c. 朱君孝. 陶器·技术·文化交流: 以二里头文化为中心的探索[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20: 191-206.
- [44] 李志鹏. 二里头文化墓葬研究[M]// 中国早期青铜文化: 二里头文化专题研究.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8: 27-30.
- [45] Courty M. A, Roux V. Identification of wheel throwing on the basis of ceramic surface features and microfabrics[J].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1995, 22(1): 17-50.
- [46] Pierre Lemonnier. Technological Choices: Transformation in Material Cultures since the Neolithic[M]. Abingdon: Routledge, 1993: 36-41.
- [47] 同[44]: 28.
- [48] 张飞. 身份构建与礼制变革: 二里头遗址墓葬相关问题补识[N]. 中国文物报, 2022-07-29(05).
- [49] 弗雷德里克·巴斯, 主编. 族群与边界: 文化差异下的社会组织[M]. 李丽琴, 马成俊,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4: 5-10.
- [50] 希安·琼斯. 族属的考古: 构建古今的身份[M]. 陈淳, 沈辛成, 译.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7: 2.
- [51] a. 叶文宪. 新夷夏东西说[J]. 中国史研究, 2002(3): 3-12.
b. 燕生东. “夷夏东西”格局下的岳石文化[J]. 海岱学刊, 2016(2): 27-41.
c. 王震中. 夷夏互化融合说[J]. 中国社会科学, 2022(1): 132-157+207.
d. 栾丰实, 王芬. 夷夏东西: 从多元到一统的重要过渡阶段[J]. 文史哲, 2024(5): 28-43+165.
- [52] a. 同[44]: 39.
b. 赵海涛. 二里头都邑聚落形态新识[J]. 考古, 2020(8): 109-120+2.
c. 赵海涛. 二里头都邑布局和手工业考古的新收获[J]. 华夏考古, 2022(6): 62-67.
- [53] 同[20].
- [54] 同[16].
- [55] 同[17]: 642-648.
- [56] a. 同[6].
b. 张飞. 夷夏关系新探: 基于二里头遗址出土岳石文化因素陶器的研究[M]// 中国区域文化研究: 第二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25: 79-90.
- [57] a. 张国硕. 论夏末早商的商夷联盟[J]. 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2(2): 91-97.
b. 同[1] f.
- [58] 同[51] c.
- [59] a. 同[4] a.
b. 同[4] b.
- [60] a. 同[1] d.
b. 同[6].
- [61] 方辉, 赵永生. 从夷夏东西到夷夏融合: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过程的考古学研究[J]. 文史哲, 2026(1): 55-170+166.
- [62] 同[6].
- [63]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新郑望京楼: 2010~2012年田野考古发掘报告[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6: 563-565.

(责任编辑: 宋笑琳)